学术前沿 · 清代中国的对外形象、认知与交往

乾隆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之礼仪及其效用

英卡尔·巴合朱力

[摘要] 清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的礼仪，对于清朝中亚政策和边疆治理兼具象征性与实效性作用。文章结合中央与地方双重视阈，呈现清乾隆朝对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接待礼仪的具体运作实态并延展了对礼仪的讨论维度。清朝在接待朝觐使团之筵宴、行围以及观阅等礼仪环节，通过精心设计的各种仪式和符号，强化中亚各部对清朝权威的认知，这是礼仪的象征效用。就清朝边疆治理的实践层面而言，赏赐礼突破了“宣示恩赏”的象征性意义，转化为管控边境的有效途径，为清朝稳固边疆的统治乃至在中亚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 清朝　中亚　使团　礼仪　权力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5－0049－014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的过程中，与中亚世界建立了广泛且密切的联系。清朝和中亚的统治者们都很清楚，保持外交的畅通与联系，对于集体政治生存和经济福祉至关重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玉兹统治者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向清廷遣使，揭开了中亚各部使团与清廷往来的序幕。随之，清廷陆续接待了来自伊塞克湖沿岸的布鲁特、费尔干纳的浩罕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巴达克山、博罗尔和爱乌罕等部派遣的朝觐使团，①呈现一派“和通诸部、次第偕来”的盛况。②尽管清朝将中亚诸部视作“外藩”，③但对中亚事务的处理，不同于对蒙古、回部及西藏等疆域管辖范围内的藩部实行边疆民族政策，而是将其视同朝鲜、安南，与其建立“宗藩关系”，实行羁縻政策。④相关先行研究聚焦于中亚某一部与清朝之使团往来或公文交流等方

[收稿日期] 2022－12－22
[作者简介] 英卡尔·巴合朱力（1991—　），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北京 100871；yingkaer@pku.edu.cn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招标项目“区域关系史视域下的清朝与中亚诸政权之互动”（7101602442）阶段性成果。

① 清朝官方文献一般将中亚各政治实体称作“部”（满文档案作“aiman”，汉语即“部”之意）。乾隆《大清会典》有“哈萨克之左、右部，布鲁特之东、西部，以及霍罕（即浩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等部”的表述。《钦定新疆识略》则有“边外诸部”之称。本文依循当时的历史语境，将其均称作“部”。

②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4《藩属·序》。

③ 清朝将位于国境之外的部族与国家视作“境外外藩”，如哈萨克、布鲁特、越南、朝鲜、琉球等，是“不属的外藩”。参见成崇德：《论清朝的藩属国——以清廷与中亚“藩属”关系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④ 成崇德：《清朝与中亚“藩属”的关系》，《民族史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0-31、159-168页。

面，[①] 鲜有研究将中亚各部朝觐使团作为一整体，考察清朝接待使团礼仪的具体运作实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礼仪的功能性意义，特别是礼仪的政治效益问题。

礼仪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的特殊象征意义，为清朝特别重视。[②] 清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所安排筵宴、赏赐及阅兵演武等礼仪环节，充满了精心设计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和仪式。首先，就礼仪的运作层面而言，档案中有关清朝对各部使团接待规格或具体赏赐等方面的细致记录，为深入分析清朝中亚政策的特殊性和层次性，提供了最直接证据。其中，清朝对哈萨克和布鲁特朝觐使臣所赏赐的顶戴花翎，是浩罕、巴达克山等其他中亚部族使臣不曾享有的“殊荣”。顶戴是清朝官员品级的标志，而花翎一般只有贵族或功绩显赫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二者均为清朝权力的象征。那么，清朝对哈萨克和布鲁特赏赐顶翎究竟一种“宣示恩赏”的符号性手段，还是具有深远战略性考量的策略，均需认真探讨。其次，礼仪不应仅视作清朝单方面的政治行为，作为礼仪参与者——中亚各部使臣的接受和反应同样值得深究。本文结合《清代新疆满文档案》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未刊《内务府档案》《军机处满文上谕档》等，兼中央与地方双重视阈，呈现清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的基本礼仪及其运作实态；在此基础上，从清朝与中亚各部互动交往和清朝内陆边疆治理实践入手，探析清朝对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接待礼仪的政治效用，从而进一步检视清朝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

一、入境及沿途地方官员的接待礼仪

中亚各部与清朝直接且密切交往的机构，主要是清朝设在新疆的各驻扎官员衙署，即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衙署等。中亚各部所派朝觐使团抵达新疆边境城市后，须先经各地官员的组织和护送，方能抵京觐见皇帝。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对浩罕和布鲁特向回疆所派使团的专题研究，提醒我们应当重视边疆地区 (local frontier level) 在清朝与中亚各部使团交往环节中的关键作用。[③] 因此，本文首先将视阈下沉到地方层面，考察新疆各驻扎官员衙署对中亚诸部朝觐使团的礼仪接待。

（一）组织护送使团

新疆各地的驻扎官员负责的事项，主要是向皇帝奏报使团名单及各部进献礼物清单，组织

① Nicola Di Cosmo, “A Set of Documents Concerning a Khokand Mission to Kashgar”, *Centra Asiatic Journal*, Vol.41, No.2(1997), pp.159−199. 濱田正美：《北京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コーカンド関係文書 9 種》,《西南アジア研究》68（2008）, 第 82−111 页。Б.Еженханұлы,“1762 жылы кіші жүз қазақтарының Цин патшалығына жіберген дипломатиялық миссяларына қатысты тың мұрағат құжаттар:қаэақ хан-сұлтандарының хаттары және Цин ұлықтарының мәлімдемелері”, *Археография Және Деректану Ұлттық Орталығының Хабарл*ары,2011ж.№1,бб.15-27.NODA Jin,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pecial Issue 1, University of Tokyo,2010. pp.152−159. 小沼孝博、新免康、河原弥生：《“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 1848 年两件浩罕来文再考》,《辅仁历史学报》第 26 期，2011 年。David Brophy，“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in Alireza Korangy and Daniel J.Sheffield eds, *No Tapping around Philology: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Wheeler McIntosh Thackston Jr’s 70th Birthday*,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p.325−367.

② 贾宁聚焦于理藩院，指出礼仪对清朝整合不同族群的重要作用，见 Ning Chia,“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4, No.1(June,1993), pp. 60−92。张永江从礼仪制度的视角，指出清朝礼部在治理多族群国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参见其《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清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③ Nicola Di Cosmo, “A Set of Documents Concerning a Khokand Mission to Kashgar”,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pp.159−199. 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 Exchange”,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Francis Group, 2003, pp.351−372.

派员护送使团和检收及解送礼物等，另外还须验收和翻译使臣所携各部统治者的书信，将其原件和译文附于奏折，先行转奏皇帝。例如哈萨克遣使朝觐的大致流程为，先由其统治者向伊犁将军（或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致信呈请，再经伊犁将军奏报，获皇帝允准后方可成行。哈萨克使团抵达伊犁后，在伊犁将军组织下被护送至京。① 因地理位置的不同，临近天山南路的浩罕、布鲁特和巴达克山等部所派朝觐使团，则是先抵达喀什噶尔或叶尔羌，再由各参赞大臣等派员护送至京。各地官员在确定使团人数、裁汰冗余跟役以及为使团配备行粮车马等事项后，再派员护送使团。

整体而言，中亚各部使团行走路线，大致为自哈密出嘉峪关后，经甘肃、陕西、山西和直隶等地前往北京，归途亦然。沿途由驿站供给食宿，更换驿马车辆，途经各地官员还设宴款待使臣。使团朝觐事毕，亦由清朝提供驿马车辆，再派员护送使团照原路返回。② 曾作为哈萨克朝觐使团成员出使清朝的贝德尔·尼格玛托夫，向俄罗斯官员谈及他出使清朝的经历时，就提到清朝对使团的沿途接应礼：

> （哈萨克使团）在中国官员和一些随从的护送下从固勒扎（伊犁）出发，骑的是经常替换的上等马，这些马在每一个地方都要换，在去北京长达一百天的路途中，给了他们按中国市价 20 卢布的白银、30 俄磅带皮黍米和面粉以及 30 所罗特拟克茶……在返回的路上，他们（清朝）同样从国库支取相同的份额。③

除周密供应使团往返途中的交通和食宿外，清朝也很重视伴送官员的素质，选派“诚信体面”的高级别武官护送使团。④ 清朝对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组织方式和沿途接待规格等方面的安排，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哈萨克朝觐使团被伊犁将军专门编为一队派员护送，而浩罕、布鲁特等部使团，多随年班回部伯克一同朝觐。乾隆二十六年，对于布鲁特希布察克部首领额穆尔遣使朝觐，乾隆帝即谕示“不必专特派来，令与年班朝觐回子等同来”。⑤ 沿途接待使团规格，也会为政治气候牵动和影响。三十二年，浩罕统治者额尔德尼伯克派遣的朝觐使团抵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绰克托拟将使团单独编为一队护送。然而，乾隆帝谕曰：“额尔德尼所派使臣毋庸另行编队送京，即与年班入觐之回子伯克等一同来京。”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要求沿途各地官员不必过优接待浩罕使团，其接待规格“照初次来使稍减、年班回子伯克稍增，斟酌办理，毋庸奢费”。但沿途官员接待浩罕使团因“供应过分”，从而被乾隆帝严斥为“甚属不成事体”。⑥ 清朝此举可能与浩罕外交龃龉事件有关。二十九年，浩罕首领额尔德尼未曾出迎清朝颁敕使臣且暗通回疆伯克的种种“不恭顺”之举，使乾隆帝断定额尔德尼“乃非安分之人”。⑦ 因此，乾隆帝下令降低浩罕朝觐使团的接待规格，以示惩戒。就此意义而言，使团接待规格是观察清朝与中亚某一政权关系的晴雨表。

（二）检收及解送礼物

除组织并派员护送朝觐使团外，新疆的各驻扎大臣负责的另一重要事项，是检收及解送中

---

① 但在乾隆三十二年之前，哈萨克经由乌里雅苏台呈请朝觐，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7 册，岳麓书社，2011 年，第 769 页。

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 51《兵部·车驾清吏司》；道光《回疆则例》卷 4《哈萨克赴热河朝觐事毕旋回准给驿马车辆》。

③ 鄂木斯克州国家档案馆，3，目录 1，案卷 423，129−132 页，转引自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杨恕、王尚达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0−71 页。

④《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2 册，第 621−622 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0−22 页。

⑤《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7 册，第 12−15 页。

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7 册，第 726−727、732、765 页。

⑦《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5 册，第 600 页。

亚各部进献皇帝的礼物。[①] 清朝对于中亚各部进献礼品的种类或具体数量等方面均无强制性要求，正所谓“贡亦无定物”。[②] 来自中亚的“汗血宝马”“白海青”等珍奇，数量非常少，重在其象征意义。多数情况下，各部进献皇帝的礼物先由朝觐使臣携来，留于伊犁、喀什噶尔或叶尔羌等地暂存，经各处官员检收再解送至京，而使臣则速行赴京觐见。[③] 马是哈萨克、浩罕和布鲁特等部首领向清朝进献的代表性礼物。为避免马匹不堪路程遥远而倒毙，清朝边臣一般将马匹暂留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饲喂歇养，再护送至京。哈萨克马一般由委护军参领等较高级别武官护送至上驷院。[④] 哈萨克和爱乌罕进献之马，尤为乾隆皇帝津津乐道，特命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著名的《哈萨克贡马图》《爱乌罕四骏图》等画作传世。[⑤] 哈萨克和爱乌罕马，令清朝君臣如此重视的原因，在于外族献马乃是“四夷归服”的重要象征意涵。[⑥] 除马匹外，浩罕、博罗尔和巴达克山亦向乾隆帝进献鹰、犬、腰刀以及枪支等物。乾隆二十五年冬，浩罕额尔德尼伯克向乾隆帝进献白海青、犬等。检收这些礼品后，边臣舒赫德认为“外藩部落进上物件，愈应完整送到京城”，即选派“知悉饲喂”之员将其妥善送京。[⑦] 浩罕所献的白海青抵达京城后，乾隆帝不但命郎世宁“绘图状其神貌”，更赋诗称颂：“黄睛玉爪气隽逸，素翘皓羽光陆离。”[⑧] 乾隆帝如此重视浩罕所献白海青，不仅仅在于其名贵珍稀，还与白海青在欧亚大陆也是王权的象征意涵有关。[⑨]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鹰隼在欧亚大陆历史上长期被当作对外交流、政治协议和军事谈判的重要礼物。其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它的珍稀性，以及它作为狩猎鸟的实用性。

（三）对朝觐使团的一般性规定

与外藩蒙古和回部不同，清朝对中亚各部的遣使朝觐，并未制定统一且严格的规范。[⑩] 清朝与中亚诸部建立联系之初，对于哈萨克、布鲁特等部遣使入觐，乾隆帝就明确表示：“听其自来，无烦催促。”[⑪] 亦即中亚各部向清廷遣使朝觐与否，皆随其所愿，正所谓“若哈萨克，若霍罕，若博洛（罗）尔，若巴达克山，若塔什罕，若爱乌罕，各效其职贡，各部来朝无定期，其贡亦无定物。自高宗纯皇帝平定西域，陆续通贡后，至今咸输诚效顺”。[⑫] 清朝底定新疆之初，布鲁特及帕米尔以西的博罗尔、巴达克山和爱乌罕等部使臣随回部年班觐见了几次之后，便中断了。[⑬] 乾隆二十八年后，喀什噶尔以西、以南中亚部族政权中，仅有浩罕被清廷允准遣使并随

---

① 在哈萨克统治者的书信当中向乾隆帝进献之物，作 tartu（或 belek），即为礼物之意。Belek，为突厥 – 蒙古语词汇，即“礼物”之意。成书于 11 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收录了 belek 这一词汇，即礼物之意。参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 1 卷，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405 页。

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 68《理藩院·徕远清吏司》。

③ 道光《回疆则例》卷 4《哈萨克等朝觐贡马》。

④《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7 册，第 24–25 页。

⑤ 郭文忠：《从满文档案和美术史资料看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以〈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为中心》，《美术研究》2018 年第 3 期。

⑥ Bakhyt Ezhenkhan–uli 厘清了清朝构建的“哈萨克即古大宛”这一历史话语的产生、发展和消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深入探讨了其意义。参见 Bakhyt Ezhenkhan–uli, “Notes on the Early Discourse of the Qing Court about the ‘Kazakh Tribute’,” in Ralph Kauz and Morris Rossabi eds. *Tribute System and Rule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99–116.

⑦《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0 册，第 221–222 页。

⑧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 45《藩属二·霍罕》。

⑨ 尚永琪：《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⑩ 外藩蒙古和回部的朝觐是在“年班”制度下运作的。清朝底定新疆之后，回部伯克年班于乾隆三十九年正式得以制度化，即回部各城伯克每年分为六班，轮流进京朝觐。（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747《理藩院·朝觐》）

⑪《清高宗实录》卷 57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辛亥。

⑫ 光绪《大清会典》卷 68《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塔什罕”即今塔什干，此处其实是指当时统治塔什干一带的哈萨克大玉兹掌权者图列比。“爱乌罕”即今阿富汗。

⑬《清高宗实录》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丁巳。爱乌罕仅在乾隆二十八年觐见了一次。乾隆二十八年后，布鲁特部基本停止入京朝觐，改为直赴喀什噶尔的驻防大臣献马请安。参见苗普生：《略论清朝政府对布鲁特的统治》，《新疆社会科学》1990 年第 6 期。

同回部年班入觐。而纵观中亚诸部，唯独哈萨克遣使朝觐至道光年间，且最为频繁。因此，清朝针对哈萨克遣使方身份、遣使频次和觐见地点等项，均作相应调整。

首先，清朝要求哈萨克遣使方须为哈萨克汗、苏勒坦或其近亲等统治家族成员。① 随着哈萨克遣使不断，个别头目“为得赏物假借阿布赉之名派遣使臣”的情况时有发生。② 清朝开始注重核查哈萨克遣使方之身份，拒绝“微末头目”派遣的朝觐使团入觐。例如乾隆二十八年，清朝边臣以“哈喇巴鲁克，不过一微末头目，与阿布勒玛木比特、阿布赉实不可比”③ 为由，将哈喇巴鲁克所派朝觐使团就地遣回。换言之，哈萨克汗、苏勒坦或统治家族成员方可遣使，其余“微末头目”只能亲自朝觐，不得遣使。其次，清朝将哈萨克遣使朝觐的周期定为隔三年一次。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开始限制哈萨克遣使次数，即便是阿布赉汗亦不得频频遣使，还规定嗣后哈萨克朝觐使团一律由伊犁走南路赴京，禁行乌里雅苏台北道。④ 至乾隆四十九年，清朝明确规范了哈萨克遣使频次：“嗣后哈萨克等前来朝觐，亦应定一个期限，隔三年前来一次。”⑤ 再次，清朝还要求前来朝觐的哈萨克使臣，须持哈萨克汗或苏勒坦盖印书信为凭。乾隆四十一年，清朝以哈萨克使臣未携印文为由，将其就地遣回，并向哈萨克明确要求：“嗣后，若有欲来朝觐者，则列入各属汗王之使臣内，或为伊等汗王之使臣，取伊等汗王之文，秋季来到伊犁、塔尔巴哈台后，差往京城，否则尽行驳回。”⑥ 最后，是对朝觐地点的调整。嘉庆年间，清朝规定哈萨克朝觐使团直赴热河避暑山庄觐见皇帝。乾隆年间有数位哈萨克汗王子弟于朝觐途中患伤寒或感染天花而客死他乡。乾隆三十八年，哈萨克中玉兹统治家族成员哈杂木在返回途中患伤寒病故。⑦ 六十年，嘉纳伯克、艾和卓、博库克等哈萨克汗王之子弟，在返回途中染天花相继亡故。⑧ 乾隆帝表示：“此等之人俱系生身，来后常多出痘，朕心委实不忍”，除赏赐银两缎匹以示抚恤外，还谕令伊犁将军：“哈萨克内再有请求来觐者，即予阻止。若笃诚恳请，务必前来，亦少遣而已。总之，致使伊等不来为宜。”⑨ 然而，哈萨克仍不断遣使朝觐，被伊犁将军就地遣回时“颇有悻悻之色”。为此，嘉庆六年，清朝规定哈萨克朝觐使团，走乌里雅苏台北路，“俟秋间前赴避暑山庄瞻觐”。⑩ 尽管路途艰辛遥远还伴随感染天花的危险，但对于哈萨克使臣来说，这仍是极具诱惑的“朝觐之旅”。

二、宫廷的接待礼仪

宫廷接待中亚各部使团最基本礼仪，是觐见礼、筵宴礼及颁敕赏赐礼。使团觐见的地点取决于皇帝的行程，使团抵达京城（或热河）后，一般在四译馆（或避暑山庄之德胜门外蒙古包）居住。⑪ 接待使团的机构，主要有礼部、理藩院、内务府以及兵部等。各机构既有专门分工，在处理具体接待事项中也会交叉重叠。譬如，来热河觐见的哈萨克使团，由武备院、热河总管、

---

①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6 册，第 244–245 页。

②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3 册，第 499–500 页；第 7 册，第 768 页。

③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4 册，第 577–578 页。

④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7 册，第 769 页。

⑤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16 册，第 655 页。

⑥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12 册，第 471–472 页。

⑦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第 111 册，第 206–207 页。

⑧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24 册，第 462、482、484 页。

⑨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24 册，第 482 页。

⑩ 道光《回疆则例》卷 4《哈萨克等朝觐贡马》。

⑪ 《内务府来文》，《营造司木库为四译馆居住哈萨克缅甸等添做杉木抬桶清册》，道光四年七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除另有注明外，均藏该馆），档案号：05-08-006-000448-0027；《总管内务府呈报查得乾隆五十六年六十年哈萨克等热河朝觐筵宴赏赉各事宜清单》，嘉庆八年二月十六日，档案号：05-0501-071。

热河道、茶膳房以及内务府等机构协同操办接待。内务府司员会同理藩院带领使臣出入，每逢皇帝出入，使臣等在宫门外站班。兵部每日在寓所预备人员照看使臣所骑马匹，步军统领衙门则派官兵在使团住处昼夜巡逻。[①]

（一）觐见礼与筵宴礼

觐见仪式中的三跪九叩礼，亦可视作清朝权力的展演。使臣抵京（或热河）安顿后，即被安排觐见皇帝。例如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乾隆帝在正大光明殿接见了哈萨克使臣：

> 设仪仗，上御正大光明殿升座。哈萨克阿布赖所遣使臣俄罗斯苏尔统等朝见，行三跪九叩礼毕，命坐，赐茶出。是晚，于山高水长赐观火戏。[②]

相较于欧洲或俄国使节因觐见礼引发的“礼仪之争”，三跪九叩礼对哈萨克、布鲁特或浩罕等部使臣而言，并未造成任何困扰。[③] 克拉拉・哈菲佐娃指出：“遵行叩拜礼并不复杂，因为在东方国家向汗跪拜是平常事。”因此，曾作为哈萨克朝觐使团成员的贝德尔・尼格玛托夫向俄国官员谈及哈萨克使团被清朝皇帝召见以及如何被款待，蒙赐何种礼物，但只字未提跪拜礼之事。[④] 觐见礼亦为中亚各部使臣与清帝近距离接触交流提供机会。二十五年正月，乾隆帝在乾清宫陆续接见了浩罕、巴达克山、布鲁特及博罗尔等部使团。使臣等行礼后，乾隆帝“命坐赐茶，召至御座前，亲加慰问”。[⑤] 二十九年，乾隆帝亦“温语慰劳”前来觐见之哈萨克使臣亨集噶尔等人。[⑥] 中亚各部使臣一般也被安排与蒙古、回部或琉球国等使臣一同觐见，而使臣行觐见礼的空间位置（“班次”或“班位”）尤为清朝所重视，在法律性质的《大清会典》中专设“班位”一级加以规定。进言之，使臣行觐见礼的空间位置，不仅体现了遣使方的地位，也反映出清朝对其重视程度。早在乾隆二十二年九月，首批哈萨克使团即被安排与琉球国使臣一同觐见，当礼部为使臣行礼之班位请旨时，乾隆帝即下旨曰：“哈萨克使臣，在琉球国使臣前行礼。”[⑦] 清朝对哈萨克来使的重视可见一斑。乾隆年间，中亚各部朝觐使臣行礼班位也明显不同。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作为正使朝觐的哈萨克汗王之子弟，在蒙古公（或贝子）之次、回部王公之前行礼，副使则在三品或六品官之末行礼。而与哈萨克区别较为明显的是，乾隆五十七年浩罕使臣来京时，仅排在京回子之末行礼。[⑧] 可以说，觐见礼的班位展现了清朝官方意识中各族群及其上层与清朝的远近亲疏关系。此外，觐见礼也成为清朝获取中亚地理知识、政治态势及风土人情的重要渠道。乾隆二十三年，哈萨克大玉兹的实际掌权者图里拜向清廷派遣以其子卓兰为首的使团觐见。卓兰抵京之后，应军机大臣所请，审定了乾隆二十二年根据哈萨克使臣描述而绘制的哈萨克地图。清廷还通过询问卓兰，了解到哈萨克汗国三玉兹之统治集团成员的谱系。[⑨] 可见，清朝对哈萨克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有相当及时的认知。乾隆二十八年，爱乌罕使臣前来觐见时，清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军机大臣还询问爱乌罕使臣该国是否有太监的问题。据爱乌罕使臣称：“温都斯坦有一千余太监。先前温都斯坦汗，因妻室颇多，曾差使太监。此辈皆由其父母情愿孩子为太监，献给其汗。汗收下后，亦赏赐银两、物件。爱乌罕原有些许太监，因攻取温

---

① 道光《回疆则例》卷 4《哈萨克热河朝觐给予食物住处蒙古包等项》。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 1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年，第 212-213 页。

③ 李皛：《乾隆年间清朝与阿富汗关系新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④ 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第 83、84 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乙卯、丙辰。

⑥《清高宗实录》卷 706，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癸亥。

⑦《礼部为皇上升殿王公大臣并哈萨克使臣行礼事宜》，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5-13-002-000009-0088；《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67-68 页。

⑧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96《礼部七・朝会・班位》。

⑨《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182 页。

都斯坦后，带走彼处太监，现爱乌罕的太监亦颇多。再，伊朗亦有太监，不知别处有否。太监之称，帕尔西语作和卓萨莱（hojosarai）。”[①] 清朝通过与使臣交谈，及时了解到爱乌罕局势及宫廷风俗。总之，觐见礼也在一定程度丰富了清朝对中亚的认知。

“凡外藩之至者，有燕衎”。[②] 中亚各部使团在京（或热河）的筵宴，主办机构为理藩院和内务府。[③] 主要仪式有进茶、行酒及观看烟火杂技等表演。二十五年正月，乾隆帝在丰泽园宴请浩罕、巴达克山、布鲁特以及博罗尔使臣，命二品以上文武大臣皆与宴，[④] 使臣等还和蒙古王公贵族一道，在山高水长品茶果。[⑤] 哈萨克使团筵宴地点多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或热河避暑山庄的万树园）。[⑥] 筵宴时，乾隆帝将哈萨克使臣卓勒齐“召至御座前赐酒成礼”。[⑦] 二十六年正月紫光阁修缮落成，乾隆帝在此举行盛大贺典。恰有哈萨克使臣卓尔波拉斯等抵京觐见，乾隆帝即在紫光阁宴请该使臣等。[⑧] 清朝宴请哈萨克使臣时，还令满蒙官员陪宴。[⑨] 观烟火与筵宴并行，素有晚膳后赏看烟火及各类技艺表演的安排，主要由内务府、礼部等处共同操办。五十二年，礼部同内务府预备高丽筋斗、鼓笛等杂技表演，供哈萨克使臣等观看。[⑩] 清朝对哈萨克使团观看烟火一事也非常重视，五十六年，哈萨克汗瓦里派遣其子阿弥载赴热河朝觐，乾隆帝命内务府为使团预备烟火。为哈萨克使团备办烟火的规格，内务府参照五十五年安南国国王阮光平观烟火的标准，所需物件耗资达四百两之多。[⑪] 足见清朝礼遇哈萨克之隆重。

（二）颁敕与赏赐礼

事实上，中亚各部朝觐使团并非皆为“贡使”，其遣使动机各异。据出使目的的不同，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有请敕使、谈判使、请兵使或求药使等。[⑫] 乾隆三十七年，哈萨克中玉兹三位统治者向清朝派遣的朝觐使团，其实各自抱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其一为博罗特继哈萨克中玉兹汗位，向清廷遣使请敕；其二为阿布勒比斯苏勒坦遣使清朝控告布鲁特劫掠之行，请求清朝调解争端；其三为萨尼亚孜苏勒坦派遣的一般性问安使团。[⑬] 清朝一般在使团觐见活动结束时，将皇帝敕谕和赏赐物件一并交与使臣带回。敕谕的内容，反映了清朝与中亚各部政治互动的重要议题。清朝颁给哈萨克早期朝觐使团的敕谕的主题，大多关于“越境游牧”。乾隆二十八年，清朝对哈萨克统治者颁发敕谕曰：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降谕哈萨克阿布勒比斯等。尔等差遣向朕请安献马之使臣伯克讷依等均妥善抵达觐见，朕已施恩赐宴伯克讷依等。并于恩赏赐宴之时，给尔赏赐……阿布勒比斯尔等蒙朕此恩之后，管束属下人等居住于各自游牧内，毋妄加越境游牧。若是恃朕之慈恤又偷至

①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第 61 册，第 193–194 页。Hojosarai，即波斯语 khāje–ye saray，为宦官、太监之意，见《波斯语汉语大词典》，商务印刷书馆，1981 年，第 941 页。

② 嘉庆《大清会典》卷 51《理藩院 · 王会清吏司》。

③ 道光《回疆则例》卷 4《回子伯克及布鲁特、哈萨克、浩罕来使应得食物等项》。

④ 《清高宗实录》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

⑤ 《清高宗实录》卷 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乙。

⑥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呈为哈萨克来京次数筵宴清单》，乾隆五十六年正月，档案号：05–0433–031。英卡尔 · 巴合朱力：《清中叶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政治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30–31 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 826，乾隆三十四年正月甲午。

⑧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464、469 页。

⑨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7 册，第 745 页。

⑩ 《礼部为筵宴哈萨克回子哈萨木应行前往预备之高丽筋斗鼓笛伎人等照例办理事致内务府》，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5–13–002–000058–0104。

⑪ 《总管内务府奏为筵宴哈萨克阿弥载预备烟火数目事》，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七日，档案号：05–0434–067。

⑫ 关于哈萨克求药使团，参见巴哈提 · 依加汉：《乾嘉时期写往清廷的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及其反映的文化会通现象》，《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⑬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10 册，第 61–66 页。

塔尔巴哈台等地游牧，则驻伊犁之将军大臣等必会驱逐尔等，并将尔等之人牲畜掳取，彼时朕亦将不加以阻止。阿布勒比斯尔等嗣后惟于各自牧地游牧，遵从伊犁将军大臣等饬付行走，以期永远蒙受朕之皇恩。特谕。①

可以说，清朝对哈萨克的主要诉求便是禁止“越境游牧”。18 世纪的中央欧亚事实上在经历一个“边疆”逐渐固定、封闭的过程，各政治实体通过不同方式明确与他者的地理界线、控制人口的跨界流动。② 随着准噶尔汗国的灭亡，此前受其压迫的部分哈萨克牧民为寻求更好的草场自然而然地向塔尔巴哈台山脉、额尔齐斯河上游流域等地游牧。在与清朝建立联系之初，哈萨克统治者阿布赉就曾遣使臣觐见乾隆帝，为其部众争取重返故地的权利。③ 此外，虽然清朝屡次向哈萨克强调准噶尔故土皆为清朝疆域，并设立诸多卡伦防范，但仍然有大批哈萨克“越境游牧”，这又导致边境劫盗纠纷案件频发。为维护边境安定，清朝借哈萨克首领遣使朝觐之机，向哈萨克颁发敕谕，明确要求各首领约束属下部众勿越境游牧。二十七年二月，乾隆帝敕谕阿布勒班毕特汗和萨尼亚斯苏勒坦等哈萨克中玉兹统治者：“尔等越界于塔尔巴哈台、巴尔鲁克等地游牧居住之哈萨克等，已由驻伊犁大臣等处将彼等驱回尔等边界内，嗣后将尔等之人妥为严管，务于边界内居住，不可妄加越界游牧居住。”④ 即便如此，仍未阻挡哈萨克“越界游牧”。可以说，清朝仅靠敕谕劝诫或派兵驱逐的方式收效甚微。为此，清朝于乾隆三十二年终于出台灵活应对方案，将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部分边境卡伦按季节内外移设，以征收定额牲畜为条件，允许他们到清朝境内越冬，春季雪融后便遣出卡伦，⑤ 这成为 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50 年代的定例。

作为“宣示恩赏”的物质表达，赏赐礼贯穿于使臣参与的绝大多数觐见活动，是清廷接待朝觐使团的重要礼仪。清朝在筵宴、赏戏、看烟火等各个接待环节，均对使臣赏赐绸缎、荷包及银两等物。⑥ 三十二年底，浩罕使臣和卓尼咱尔、拜默特等与回部伯克一同抵京觐见。⑦ 据军机处对浩罕使团的赏赐清单：

乾隆三十二年，赏额尔德尼（浩罕统治者——引者注）并来使缎匹等物单。瀛台，赏来使霍卓尼杂尔、拜莫特，每人小卷五丝缎二匹、锦缎二匹。中正殿，赏每人火镰一把、磁器一件。重华宫，赏每人小荷包二个、玻璃器皿二件、茶叶二瓶。紫光阁，赏每人银一百两、龙缎一匹、洋缎一匹、小绒袍褂一套、花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毡绒二匹、灰鼠皮一百二十张。赏额尔德尼，蟒缎一匹、妆缎一匹、金字缎一匹、闪缎三匹、八丝缎三匹、大缎一匹、五丝缎三匹、绸二匹、绫二匹、玻璃器皿一件、磁器二件、茶叶四瓶、鼻烟一瓶、鼻烟壶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赏霍卓尼杂尔等跟役六人，每人小卷五丝缎一匹、银十两。⑧

在中正殿觐见、紫光阁筵宴等环节，清朝均对浩罕使团进行赏赐，所赏物品主要是绸缎、茶叶及瓷器。然而，通过比较便可以发现，中亚诸部朝觐使臣，只有哈萨克和布鲁特使臣享有冠服

---

①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为敕谕哈萨克阿布勒毕斯约束属民安居不得越境事》，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档案号：03-18-009-000031-0003。

② 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0, No. 2(Jun 1998), pp. 263-286.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甲子。相关研究参见 Bakhyt Ezhenkhan-uli, “Abulai Khan’s Understanding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Kazakh Pasturelands in a 1760 Letter to the Qing Court,” *Saksaha*,Vol.15, 2018.

④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为哈萨克阿布勒巴木比特等遣使入觐照例赏赐缎匹等物并敕谕伊等约束属下不可越境游牧致遭驱逐事》，乾隆二十七年二月，档案号：03-18-009-000030-003-0041。

⑤ 《清高宗实录》卷 780，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己卯；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17 页。

⑥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48 册，第 319-320 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 801，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辛巳。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二年赏额尔德尼并来使缎匹等物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90-2945-006。

赏。哈萨克早期朝觐使团所得冠服赏的等级相当高，乾隆二十三年，清朝对遣使的哈萨克大玉兹统治者阿比里斯、汗巴巴等人，均赏赐“镶宝石顶元狐皮帽、四团龙貂皮补褂”各一件，而对亲自前来觐见的使臣卓兰等人，则赏赐“顶珠翎子元狐皮帽”。① 四团龙补褂并非一般赏赐物，据清朝的冠服制度，“皇子教育宫中，俱服四团龙补服”，② 即通常只有皇族才能穿绣有“四团龙”的衣服，足见其象征的地位之高。二十四年后，关于清朝对哈萨克朝觐使臣赏赐不同品级顶戴花翎的实例，在文献当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③ 布鲁特朝觐使臣也得到不同品级的顶戴花翎。二十三年，游牧于塔拉斯一带的呼什齐部、启台部、萨鲁部之首领率众归附清朝，派遣其使臣赴京朝觐，清廷即对呼什齐部所派使臣舒库尔 (šukur) 赏赐三品顶戴花翎。④ 同年，亦对赴京朝觐的萨雅克萨尔巴噶什部之使臣图里凯（tulikei）赏赐四品顶戴花翎。⑤ 二十五年，呼什齐部首领纳喇巴图 (narabatu) 派遣其弟拜多罗特抵京觐见，清朝即赏戴拜多罗特花翎外，对随同其前来百人长蒙固里克（monggūlik）、雅满泰（yamantai）二人，亦如同其他布鲁特等子弟赏戴蓝翎。⑥ 相较而言，无论是顶戴花翎的品级抑或数量，清朝对哈萨克使臣之赏赐远高于布鲁特。五十五年，清朝对初次觐见的哈萨克使臣，除赏蟒袍、补褂外，还加赏缎匹、瓷器、银两等物。⑦ 嘉庆年间，清朝对冠服赏项予以规范：“朝觐之哈萨克等视其品级分别赏给衣服等物。初次来京者，视其来使品级赏戴翎顶，仍赏给衣服等物。副使内遇有初次来京者，亦赏戴六品顶戴衣服等物，交内务府制造带至热河备赏。”⑧

三、礼仪之效用

从清朝与中亚诸部互动交往及清朝的边境治理实践来看，礼仪的功能性意义尤为突出。除上述筵宴、赏赐等程式化的基本仪轨外，清朝在接待使团的礼仪中，精心设计各种仪式和象征——为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特别安排阅兵、行围等礼仪。这对于强化中亚各部对清朝权威的感受和认知以及稳固边疆的统治，均有一定的功能性意义。

（一）阅兵演武礼：强化中亚各部对清朝权威的认知

仪式是引导情绪、形成认知的重要手段。清朝在接待中亚朝觐使臣的礼仪环节中，安排阅兵演武礼，以强化中亚各部对清朝权威的认知。乾隆二十三年，清朝将领兆惠在军营接应首批赴京朝觐的萨尔巴噶什、萨雅克部布鲁特使臣时，就特别安排武艺表演。筵宴时，兆惠除安排步箭、马箭、摔跤等武艺外，还令健锐营、吉林满洲索伦等骑马飞奔三次放枪，向左五次射箭，一次放枪后两次射箭。兆惠的奏折就记录了布鲁特使臣等观看武艺后的反应：

> 众布鲁特等合掌称奇，大国弓箭历害！虽曾听闻，然骑马飞奔多次放枪，枪不弃置，仍旧背负，又多次射箭如故，如同已经离马着地，复行乘骑飞奔，委实神奇。不但我等未曾眼见，自我等父祖以来，亦未曾听闻。我等心中曾以为布鲁特、哈萨克之鸟枪即已甚好，现观此，我

---

①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第 45 册，第 434 页。

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 3《宗人府·仪制》。

③ 《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外裔》。《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45 册，第 384 页；第 48 册，第 319 页；第 192 册，第 397 页。《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 2 册，第 60 页；NODA Jin,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pp.157–158.

④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8 册，第 135–139 页。

⑤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46 册，第 279–282 页。

⑥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44 册，第 341–342 页。

⑦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92 册，第 397 页。

⑧ 道光《回疆则例》卷 4《哈萨克赴热河朝觐赏给翎顶衣服等项》。

等放枪又何足道哉。准噶尔之厄鲁特等在此弓箭、鸟枪之下毁灭，理所当然也。等语。[①]

“耀武”所收“扬威”之效用，从布鲁特使臣观看反应可见一斑。据清朝将领透露，观看之布鲁特使臣返回后，便传扬清兵技艺高超，“优秀厉害男子甚多”。[②] 与此同时，哈萨克和布鲁特朝觐使臣在觐见皇帝期间，清朝还特别安排他们参与木兰行围以及观看大阅礼。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帝进行射猎和训练八旗骑射习武的军事重地。木兰行围与围班制度一道，成为清帝拉近与外藩蒙古王公之间的关系、增进双方亲近感的重要方式。[③] 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清朝将前来朝觐的哈萨克、布鲁特使臣均带至木兰参与射猎活动。[④] 木兰行围声势浩大，有时多达3万余人。[⑤] 行围期间，清朝通常展示皇家弓箭等武器，并安排满洲和蒙古贵族分别统领队伍进行战斗演习等仪式。乾隆帝曾明确指出安排哈萨克和布鲁特使臣参与行围的用意：“外夷惟知重武，宴会百戏彼虽乐观，终不若示以射猎，彼乃诚心悦服，不敢轻视中国，故朕每于此亟亟焉。”[⑥] 出于这种策略性考量，二十五年，为了哈萨克使臣都勒特柯勒等人有足够时间参与行围，乾隆帝“特命展加二日，俾得扈从预观”。[⑦] 此外，清朝还安排中亚各部朝觐使臣观看“大阅”（即阅兵仪式），以示军容。大阅不仅是皇帝对国家军事实力的一次全面检阅，也会因时势所需，发挥其宣扬国威、抚绥安邦之功用。[⑧] 二十三年九月，哈萨克大玉兹和布鲁特萨尔巴噶什、萨雅克等部使团觐见。时值清朝平定回部的关键时期，为了使哈萨克、布鲁特人等“观我军容”，乾隆帝举行了继登基首次大阅之后最隆重的一次大阅礼。[⑨] 清朝非常重视此次大阅礼，乾隆帝事前还特别指示备马二千匹令翼队官兵骑乘，以壮观瞻。[⑩] 二十八年正月，哈萨克、爱乌罕、浩罕及巴达克山等部使臣觐见期间，清朝在畅春园西厂也安排了大规模阅兵仪式，邀使臣等观摩。[⑪] 由此可见，清朝通过阅兵典礼，向使臣“示我国家耿光大烈”之意昭然。[⑫]

除了特定仪式外，清朝还在筵宴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的场所，精心设计象征意义极强的视觉符号，不断强化中亚各部对清朝权威的认知。二十六年正月紫光阁改建落成，时值哈萨克使臣卓尔波拉斯等觐见，乾隆帝即在紫光阁筵宴该使臣等。[⑬] 此后，紫光阁成为清朝每年正月赐宴蒙古王公和外藩使臣的重要场所。乾隆年间，凡正月抵京觐见的中亚各部使臣，均在紫光阁享宴。如果留意紫光阁的收藏和陈设，便可领会清朝这一安排背后的特殊用意。紫光阁陈列了大量与战役相关的文物，包括功臣像、战图铜版、得胜旗纛和缴获兵器等物。其中关于平定准噶尔和回部战事的《平定伊犁回部功臣像》《平定西域战图》等大型纪实性画作陆续绘成，悬于紫光阁内四壁，供使臣等观瞻。绘图当中所展现的“献俘仪式”“凯旋庆功”等战争画面交相辉映，形成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从而使得紫光阁超越筵宴场所的一般功能，转化为向参观者——中亚各部使臣炫耀武功的重要场域。进言之，清朝通过这种方式，向中亚各部使臣展现天山南北归属清朝的事实，以及清朝统治新疆的合法性。

---

①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30册，第255页。
②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30册，第354页。
③ Ning Chia,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pp. 60−92.
④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4《藩属一·左部哈萨克、右部哈萨克》；卷45《藩属二·东布鲁特、西布鲁特》。
⑤ 王淑云：《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宫》，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⑥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4《藩属一·左部哈萨克》。
⑦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4《藩属一·左部哈萨克》。
⑧ 张琼：《清代皇帝大阅与大阅甲胄规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⑨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1册，第172页。
⑩ 《清高宗实录》卷574，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子。
⑪ 《清高宗实录》卷678，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丁卯。
⑫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4《藩属一·右部哈萨克》。
⑬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1册，第464、469页。

（二）赏赐礼：稳固清朝对边疆的统治

赏赐礼，特别是清朝对哈萨克和布鲁特赏赐顶戴花翎之礼仪，为清朝切实有效地管控边境地带，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哈萨克和布鲁特在边疆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尤为清朝所重视，正所谓“为我屏藩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二部落而已”。[①] 清朝很清楚，在边境地带获得哈萨克和布鲁特等游牧部族政权的支持与配合，于边境的管控至关重要。早在平定准噶尔和回部期间，清朝就以赏赐顶戴花翎及缎匹等物的方式笼络布鲁特人，以获取兵力及军事情报。[②] 二十四年，正值清朝征讨大小和卓的关键时期，曾亲自觐见而被厚赏的布鲁特萨尔巴噶什、萨雅克等部头目，积极出兵协助清朝。[③] 相关事例表明，顶翎政策实施初期即显露效益。布鲁特萨雅克、萨尔巴噶什部之头目图里凯，曾亲自朝觐并获四品顶戴花翎。二十五年，图里凯在闻悉喀什噶尔骚乱之况后，同众布鲁特头目率领百余名兵丁赴喀什噶尔，欲协助清朝官员擒拿作乱人等。在会见清朝官员时，图里凯等人表示：“我等游牧之布鲁特等进京朝觐时，大皇帝不惟加恩降训，且又多赏衣冠缎匹等物。伏思我等布鲁特涓埃未效，即沐沛不称重恩，我等全部落人等日夜心怀感激。”[④] 尽管图里凯等抵达喀什噶尔前，作乱人等就已被清朝抓获，但清朝官员为嘉勉布鲁特头目人等领兵前来探信协助之举，对其礼遇有加。布鲁特冲巴噶什部游牧地紧邻喀什噶尔东北、西北卡伦以外一带，与清朝关系十分紧密。二十四年，冲巴噶什部头目阿瓦勒比和蒙乌尔亲自朝觐时，清朝就分别赏赐其五品顶戴花翎和六品顶戴蓝翎。[⑤] 次年，阿瓦勒比即协助清朝缉获逃人：

> 冲噶巴什布鲁特五品顶翎阿瓦勒比，于捉拿逃人乌朗喀等案，遵从奴才指交，拨给布哈巴图鲁富虎等八名布鲁特兵派往后，又拣选八名布鲁特回子，防堵乌什来路，寻踪拿获乌朗喀七名逃人送来。故奴才酌情先赏给缎二匹、狐皮四张情形曾经奏闻。今（阿瓦勒比）又派出蓝翎蒙乌尔等十二名布鲁特，先后拨给官长保等，拿获乌朗喀等十四名逃人，并带驼马六峰、口食羊二只接应，抒诚效力。[⑥]

有赖于阿瓦勒比的协助稽查，乌朗喀最终被缉获归案。此外，阿瓦勒比还曾亲自领兵，协助清朝平息乌什之乱。三十年，阿瓦勒比就与希布察克散秩大臣阿奇木等布鲁特头目，一同领布鲁特兵前来“随军效力”。[⑦] 获赏顶翎之布鲁特头目，在乌什之乱时为清朝提供军事支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赴京朝觐获顶戴花翎之奇里克部的额森、诺依古特部的额木贝尔等布鲁特头目，均“奋勉效力”，协助清朝平息乌什之乱。[⑧] 此外，入觐得六品顶翎的奇里克部之阿散拜，还在乾隆四十三年因“办公出力”被清朝抬高顶翎品级。获顶戴花翎的布鲁特头目为清朝提供军事支持或出力协助清朝边吏管理边境事务，对清朝稳固回疆的统治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获赏顶戴花翎的哈萨克使臣，亦协助清朝处理边境劫盗案件。毗连哈萨克的伊犁、塔尔巴哈台边境众多部族混融共存，抢盗牲畜案件频发，给边境地带的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哈萨克中玉兹统治者阿布勒比斯苏勒坦与清朝关系最为密切，由其统领的乃蛮等众多部落游牧于清朝边境卡伦附近的广大地区。清朝十分重视与阿布勒比斯家族之间的关系，对亲自朝觐的阿布勒比斯之子卓勒齐、嘉岱、库库岱等人，均赏赐品级颇高的宝石顶戴双眼花翎。而这些获赏顶戴花翎的哈萨克人，亲自出力协助清朝缉拿盗犯的例子屡见不鲜。五十年，塔尔巴哈台边境卡伦附

---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外裔》。

② 陈柱：《清朝权力在西天山地区的推进——以清朝与布鲁特宗藩关系的建立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

③《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33 册，第 163–165 页；第 36 册，第 110–112 页。

④《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46 册，第 279–282 页。

⑤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布鲁特》。

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49 册，第 230–234 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 731，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乙亥。

⑧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布鲁特》。

近发生盗马案时阿布勒比斯四子嘉岱就亲自押解盗犯送交清朝："嘉岱亦奋勉效力，且为先前来觐见之人，今又押解贼犯等解送塔尔巴哈台，著施恩赏赐嘉岱朕所佩带之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并由该处库内赏大缎两匹，以示嘉奖。"[①] 嘉岱曾于四十八年亲自朝觐，获宝石顶戴双眼花翎。[②]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嘉岱亲自出面将盗犯送交清朝，协助清朝审理盗案。无独有偶，同为哈萨克王阿布勒比斯之子库库岱，于五十五年觐见时获宝石顶戴双眼花翎。当乾隆六十年清朝与哈萨克边境发生盗马案时，库库岱即将盗贼及所盗马匹查出，亲自送至清朝边臣衙署。[③]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顶翎从象征性的权力符号，转化为接受者协助清朝办理一系列边境事务。

其次，顶戴花翎作为清朝权力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布鲁特社会旧有的权力体系。清朝特别注重官兵戴用顶翎一事。早在追剿准噶尔余党进入哈萨克草原之时，清朝就对出使哈萨克之使臣与护从兵丁赏戴各色顶戴，以添色观瞻，宣扬威势。清朝在底定西域、统一天山南北之后，规定每年巡查边界及护送朝觐使臣的官员均须佩戴顶翎，"始壮观瞻，外藩且易听命"。[④] 换言之，清朝试图通过象征权力的视觉符号——顶戴花翎，强化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部族对于清朝权威的认知。而这一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预期效果。二十四年，哈萨克使臣伯克讷觐见乾隆帝时，就佩戴其先前获赏之顶翎"意殊自喜，示荣侣伴"。[⑤] 在边疆地带，清朝边臣注意到"布鲁特人等视顶翎甚为尊贵"[⑥]，哈萨克人亦"珍视顶翎"[⑦]。顶翎的政治权威在哈萨克和布鲁特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成为接受者借以抬高其自身地位的政治符号。游牧于清朝西北边境卡伦外哈萨克图尔图勒氏族之头目图伯特 (tubet) 曾作为使臣朝觐获赏顶戴花翎。五十七年，他因"奋勉效力"而被抬高顶戴品级后，就表示"我实于哈萨克内更得人情，愈为尊贵而不胜感激，欢忭不尽。嗣后，我惟有顶戴大皇帝施降重恩，于一切事务更加竭力奋效，以期仰报大皇帝所施天恩"。[⑧] 如果说顶戴花翎之于哈萨克人，是借以抬高自身地位的政治符号，那么，顶戴花翎对布鲁特社会而言，则意味着清朝权力的嵌入式建构。18 世纪中叶，布鲁特各部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布鲁特其首领称为"比"，比以下即"阿哈拉克齐"。诸部之比"各君其地，各子其民，力敌势均，不相统辖"。[⑨] 这种单一且分散的权力结构，为清朝权力的嵌入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清朝对布鲁特赏赐顶翎政策实施初期，就颇有成效地将指定赏赐顶翎的对象与布鲁特社会内部权力更迭融为一体。乾隆二十七年，布鲁特希布察克部头目额穆尔比之弟穆鲁特主动请求清朝赏赐顶戴花翎。[⑩] 清朝对布鲁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从上述穆鲁特主动请求赏赐顶翎之例可见一斑。希布察克部在布鲁特诸部之中实力强大，其首领阿奇木堪为布鲁特之望族，被清朝授为散秩大臣。[⑪] 额穆尔为阿奇木之弟，于乾隆二十六年率部归服，被清朝授予三品顶戴。[⑫] 据上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的奏折透露，额穆尔亡故后，清朝指任其弟穆鲁特管理游牧。穆鲁特继而请求清朝赏赐顶翎，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清朝赏赐的顶戴花翎，在布鲁特

---

①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18 册，第 502、510 页。

② 《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外裔》。其名在该文献中作"噶岱"。

③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24 册，第 479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800，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丁卯条。

⑤ 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 44《藩属一・右部哈萨克》。

⑥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7 册，第 12–15 页。

⑦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95 册，第 429 页。

⑧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80 册，第 3 页。该折题目似有误，根据内容可知永保奏请将图伯特顶翎抬高为五品。

⑨ 乾隆《西域闻见录》卷 3《外藩列传上》。

⑩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7 册，第 12–15 页。

⑪ 武沐、张峰峰：《论乾嘉年间希布察克部布鲁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⑫ 《清高宗实录》卷 633，乾隆二十六年三月戊辰。

社会中会催生出崭新的秩序。随之，愈来愈多的布鲁特首领被赏以不同品级的顶戴，并直接受到回部参赞大臣节制，即“(布鲁特)大小头目皆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放，给以翎顶二品至七品有差”。[①] 晚近研究亦表明，清朝赏赐布鲁特顶翎之效用与清朝正式颁授的官职似乎并无二致，顶翎虽无官职之名但有官职之实。[②] 至嘉庆十二年（1807），17 个布鲁特部落之首领，几乎都要经过清朝的选任，总共有 63 个头目被清朝授予品级不等的顶翎，其中仅希布察克一部，就有多达 18 个头目被清朝授予顶翎。[③] 质言之，清朝对布鲁特赏赐顶翎的政策，形成一股强烈的纵推力，不断冲击、瓦解布鲁特游牧社会内部旧有的以“比—阿哈拉克齐”为核心的权力体系，逐渐将其纳入清朝的等级制度下的权力网络。

四、结语

18 世纪中叶，清朝以荡平准噶尔、横扫天山南北之势在中亚世界树立起强大的形象，为中亚各部寻求更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争取更多的利益，以保护其部众提供了可能。这种情境刺激了中亚各部族政权向清朝派遣使团。即便存在感染天花的风险，中亚使者们仍踏上出使清朝之路，将信息与礼物带至清朝。而使团接待礼仪在清朝与中亚各部的政治互动环节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清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所安排的沿途接应、筵宴及赏赐等礼仪，可谓事无巨细，均有所准备。清朝接待使团的机构，从地方官员到军机处、理藩院、礼部、内务府乃至兵部等中央机构均参与其中，足见清朝对中亚使团的重视。清朝注重运用与蒙古政治互动的经验，同中亚诸部展开交往，行围、满蒙官员陪宴等礼仪环节的特殊安排皆为明证。清朝还根据中亚各部的势力强弱、地缘政治地位以及与之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中亚各部使团的组织方式、沿途接待或具体赏赐规格的安排都不尽相同，其中尤以哈萨克为首重，而布鲁特、浩罕等部次之。质言之，清朝与中亚诸部关系非匀质化的结构性特征，同清朝对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接待礼仪规格的层次性，互为因果。

清乾隆朝通过与中亚诸部建立起的藩属体系，不仅有效地管控与稳定了边境地带，也使得中亚地区东部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的局面。清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的礼仪，对清朝中亚政策和边疆治理兼具象征性与实效性作用。首先，清朝在接待使团的筵宴、行围及观阅等礼仪中，通过精心设计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仪式或陈设，强化中亚各部使臣对清朝权威的认知。具威慑之功用的阅兵、演武等非常规性特殊礼仪，也是清朝因时势所需的权宜之计。其次，就清朝边疆治理的实践而言，赏赐礼成为清朝强化边境管控的重要手段。哈萨克与布鲁特在清朝西北边疆地缘政治格局当中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对二者所实施政策的特殊性和实效性。赏赐礼突破了象征性功用，转化为管控边境的有效途径。获赏顶戴花翎的哈萨克使臣，协助清朝处理边境劫盗案件，为清朝边境治理出力颇多。而清朝通过对布鲁特赏赐顶翎，加强对布鲁特社会的控制。换言之，清朝对布鲁特的赏赐礼，从清朝单向度地宣示“恩赏”的符号性手段，演变为受赏者承认清朝权威并且被纳入清朝等级秩序。这一点与蒙古颇为相似，正如艾骛德（Atwood）指出，蒙古贵族要从清朝统治者获得赏赐，就必须

---

① 嘉庆《伊犁总统事略》卷 11《布鲁特源流》。

② 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 Exchange”,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pp.351–372. 张伯国：《翎顶赏赐制度与清代布鲁特治理新探》,《贵州民族研究》2018 年第 9 期。

③ 嘉庆《伊犁总统事略》卷 11《布鲁特源流》。

证明自己是值得的，并努力报答皇恩。[1] 总之，礼仪深深地嵌入清朝与边外族群的互动交往，也嵌入清朝对西北边疆的治理。皇帝的权威披着赏赐的外衣，在不以政区为限的更广阔的地域内发挥着政治影响力。

References

Atwood Christopher Pratt. "'Worshiping Grace':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Mongolia". *Late Imperial China* 21. 2 (2000).

di Cosmo, Nicola.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3.

Б. Еженханұлы. "1762 жылы кіші жүз қазақтарының Цин патшалығына жіберген дипломатиялық миссяларына қатысты тың мұрағат құжаттар:қаэақ хан−сұлтандарының хаттары және Цин ұлықтарының мәлімдемелері". Археография Және Деректану Ұлттық Орталығының Хабарлары, 2011ж. №1.

Chia Ning.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14, 1(1993).

NODA Jin,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pecial Issue 1,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ZHANG Yongjiang. "Liyi yu zhengzhi: qingchao libu yu lifanyuan dui feihanzuqun de wenhua zhili" (Rites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 the non−Han ethnic groups by the Board of Rites in the Qing Dynast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19).

The Qing Dynasty's Rituals of Reception for Central Asian Tribute Missions and their Utility in Qianlong Regin

INGKAR Bakhetjol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yingkaer@pku.edu.cn)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s Rituals of Reception for Central Asian Tribute Missions were symbolically and practically used to further policy on Central Asia and to govern the frontier. Based on relevant Manchu documents, this essay presents the Qing Dynasty's rituals of recept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tribute missions and its actual operation. This paper also extends the dimension of analysis of rituals. First, the Qing court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Qing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 by elaborate designs of speci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the rituals of banquet, imperial hunt and military parade. That was the symbolic effectiveness of the rituals.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ng the frontier, the rituals were considerably effective politically. The ritual of *Shangci* had been broke through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transformed to powers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governing the northwest frontier and enhance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Central Asia, missions, rites, power

① Christopher Pratt Atwood, "'Worshiping Grace':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Mongoli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1, No.2, (2000), pp. 86−139.